

《创业史》的修改与传播

谷 鹏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为了不断追求文艺政策的时代性,“十七年文学”中的许多小说在初版后便处于不断修改的状态,柳青的《创业史》便是一个典型。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创业史》的修改主要涉及传播主题、传播主客体、传播载体和传播内容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创业史》不同版本的修改历程,清晰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演变的复杂内涵。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创业史;版本;修改;传播;红色经典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175-06

生活在1950年代的中国作家,他们以历史镜面的样式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作家本人及其作品基本都烙上了特定历史时段的印痕,在这些印痕中最为醒目的是对出版作品的不断修改。由于修改,这些作品成为特定历史时段的旗帜,作家本人也成为创作领域的楷模。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修改”的确使得初版本的作品在艺术表达的生动性、清晰性等方面有了相应完善,但这种“修改”的初衷并不是作家艺术修养的提高、读者的接受与反馈,而是初版本作品传播环境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变化。为了追求作品政治上的正确性,适应不断变化的文艺政策的评判标准,作家不得不对出版本作品进行“必然修改”。《创业史》便是如此。

《创业史》第一部四易其稿,1959年4月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后由《收获》一次性登完。根据《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版说明”,按照作家柳青的创作思路,他计划在第二部中写农村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跃进,直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但随后的历史轨迹使得《创业史》宏伟的创作计划被迫停止,因此,现存的只是《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七章。这部描写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未完成”的“史诗性巨著”,基本奠定了当时有关土地、

农村、农民等同类题材小说的写作方式,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1],这确实是件悲哀的幸事。

由于传播载体、传播时段的不同,《创业史》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以最初《延河》杂志上的初刊本与1977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的《创业史》相比较,小说文本内容有着极大的变化,这种前后迥异的现象与创作主体、文本传播方式、读者接受反馈与传播环境变化等相关传播环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一、传播主题的修改

《创业史》在《延河》杂志连载时,主题是通过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中农村各阶层的新变化和组合,揭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现实和基层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初刊本小说以杂志为载体,在传播过程中把“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上升到“创业者的心灵史”高度,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永恒的生命力印记。然而,在1977年以书籍为载体的再版本中,主题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以梁生宝为主人公的叙述者带领农民所做的一切,佐证党内“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主人公由梁生宝变为改霞和郭振山等人,他们拿着党内的路线方针,站在

* 收稿日期:2009-12-01

作者简介:谷鹏(1977-),男,江苏建湖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媒介生态学和文化传播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文化批评理论研究”(09YJC86019),项目负责人:曾一果。

高山之巅俯视世间。这种变化典型地反映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

小说第十五章写到改霞为什么要考工厂时,《延河》1959年6期上是这样回答的:“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样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鼓舞。”而1977年版这一段话删去后换成:“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2]245}同一章当改霞要进工厂又不忍舍弃自己深爱的梁生宝时,作者增加了这样一段话:“听下堡小学的一个教员说,党中央书记刘少奇讲话,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自发势力这么厉害,一个小小的互助组,能掀起多大浪!这样我留在蛤蟆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个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投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2]247}第十九章改霞准备考工厂前,柳青又新添了这样一段话: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改霞问郭振山:“刘少奇在党里头是……”

“毛主席下来就是他!”郭振山带劲地说,“你问这个话做啥?”

改霞说:“俺学校有个教员说,刘少奇讲国家要先工业化,然后农村才能集体化。”

“啊!你也听说啦?”郭振山满意地说,“这该明白了吧?”^{[2]337}

这样的修改,表明柳青并未真正坚持其艺术创作的标准。《创业史》初次在《延河》连载时,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目的各异的点评。柳青1961年秋回复《文汇报》编辑的信中,就怎样评析徐改霞形象谈了自己的看法:评论家应“在广阔历史背景上”,而不应“片面地配合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的中心任务来分析形象”;作家通过创造人物形象发挥的“观点”、表达的“感情”,已化为艺术形象,不需另写文章补充和解释^[3]。但1977年再版本却“白纸黑字”地否定了这样的艺术坚持,成为“听党的话,不断改造思想”^[4]。在“第一部的结局”里,柳青在摘引和解释了中央的决议之后,紧接着添加说:

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谓“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呀,“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呀,“四大自由”呀,“确保私有财产”呀,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资本主义思想的泛滥,到一九五三年冬天才煞住了这股逆流。^{[2]552-553}这些话语的添加使得再版《创业史》与1959年

连载的《创业史》在内容上面目全非,从而使最初的主题南辕北辙。小说本来是反映“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5],旨在揭示这场运动中的社会矛盾,表现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但在1977年修改时,作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1976年已经结束,但这段时间里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历史评价并没有结束。修改后的小说文本从第十五章到“第一部”的结局,作者用冗长的篇幅强调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等。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题的改变,小说文本的叙述接受者同样发生了变化。《延河》连载时,作者所设计的叙述接受者是新中国成立初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一定共产主义基本觉悟的先进农民,有可能逐步提高思想觉悟的农民,也有那些难以克服私有观念思想的农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克服自身弱点,走集体合作化道路,最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但1977年《创业史》则截然不同于以前,叙述接受者变为在“党内路线”斗争下方向抉择的表现者。

初版中,改霞因感情难以割舍,在是否去考工厂面前犹豫不决,受到郭振山的挑拨,怀疑梁生宝“一个小小的互助组,能掀起多大浪”而要离开农村阵地;再版本中则改为“党中央书记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句话使她下决心进城。这样一来,小说的叙述接受者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表现在“党内路线”斗争立场的表现者,除了改霞、郭振山可以明显体现外,梁生宝、欢喜、高增福、秀兰、梁三老汉、郭世富、姚世杰、韩培生等作品中出现的人物都无法直接区分他们的身份色彩。这种为了极力配合文艺政策要求的硬性改动,不但不能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反而有损人物和作品的真实,从而严重危害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传播主客体的变化

叙事的表层结构包括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叙述话语三部分。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参与者,通过相应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展最终创造叙事文本。当小说在具体媒介上刊载时,小说的叙事者变化为传播主体。

在初刊本《创业史》中,传播主体主要由作者柳青和他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共同构成。在《延河》连载时,柳青通过梁生宝这位叙述者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讲述了1950年代初农民如何思考和理

解党的农村政策,最终创作了我国农民从分配土地到走合作化道路过程的叙事文本——《创业史》的第一部,同时,柳青本人就土改诸多事件的感喟和议论也成为叙事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说就是梁生宝以叙述者所发出的土改运动中种种工作内涵的“叙述语”,以及柳青本人在小说文本中直接发表的意见、议论和抒情。

因此,在初刊本《创业史》中,作为传播客体的叙述接受者既不完全不是作品的读者,也不完全等同于小说故事中某个人物精灵式的角色,而是所有叙述者发出的叙事话语的接受对象。就《创业史》而言,它的叙述接受者可以是所有阅读《延河》杂志这篇连载小说的读者,也可以是作品中主要人物,如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高增福、梁三老汉、素芳、改霞等人。所有这些客体共同构成小说文本的传播客体,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梁生宝的各项工作,他们在作品的阅读中感受当时土改政策的及时性、可行性与迫切性,主动投入到我国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土改运动中。此时,《创业史》在《延河》连载的传播效应便成功地体现出来,《创业史》方成为那个时代的传播经典。

而在1977年再版中,《创业史》以书籍方式在社会领域继续传播,传播主客体发生了明显改变。此时的传播主体不再是柳青本人,也不再是原先读者熟悉的梁生宝,而变为改霞和郭振山,这主要是因为小说文本的主题变化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此时的传播主体不再关心具体的土改事件,而是聚焦土改政策与理念的正确性和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性,此时的作家柳青已基本失去初刊本影响读者自觉投入土改运动的实践性和主动性,而是千方百计地转述当时国家政策的具体条文,以强化改霞和郭振山等传播主体的先进性和觉悟性。

再版本《创业史》因传播主体的变化而导致传播客体明显变化。这与时代性的变化之间有直接关联,《创业史》再版时,土改运动已成历史,1977年的读者还沉浸在刚刚过去的历史阴影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注曾经轰轰烈烈的土改事件。但实质上,柳青1977年再版《创业史》时,他混淆了“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两个概念,用“话语讲述”的50年代来反映“讲述话语”的70

年代。柳青通过对70年代文艺政策的政治式图解,指望再版本《创业史》依然能产生初刊本时的传播效应,希望小说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潜移默化地体现政治觉悟的与时俱进,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柳青是真诚的,不变的是他创作思想的一贯性,始终自觉地和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无私地为党的文学事业奉献个人的才智^①;变化的则是他思绪的内容,是那些不断被修改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这些不变思想和变化的内容,其本质上正如柳青自己所言:“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4]

三、传播载体的变化

许多研究者在探究《创业史》的不同内涵时,几乎都忽略了传播载体这个研究细节。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肯定当初《延河》杂志上连载的《创业史》(包括《收获》杂志一次性刊完),而对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的书籍《创业史》颇有微词,甚至直面质询。这其实与传播载体有着必然联系。

作为期刊的一种,杂志是一种有固定出版周期、固定名称,并以期号连续不断的形式间隔地、不断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它根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将众多作者的作品汇集成册出版,既有对某类社会现象、热点问题的综合报道,又有对此的背景分析和综合评论,具有时效性、持续性和可修改性。而作为出版物的一种,书籍是出版行为的成果,它承载着一定信息知识,以复制的方式向公众传递信息产品,具有出版时间的不定期性和作品的完整性。

读者和研究者之所以大多肯定《延河》连载的《创业史》,是因为受到杂志时效性的影响,这是阅读心理使然,即在阅读杂志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辨别杂志出版的具体时间,并自觉地将阅读内容与发行年代联系起来。1959年4月,《延河》开始连载《创业史》,我国正处于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进程中,“1953年,党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第一个是1953年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二个是1953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在这两个决议的指

^① 《创业史》为柳青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在北京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柳青作了亲切交谈,询问他皇甫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这次谈话大大鼓舞了柳青。“一九六〇年八月,柳青开完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回到皇甫村以后,首先到皇甫管理区询问生产情况,关心村里、队里、管理区的生产和工作。同年,他动笔写《创业史》的第二部。他上午写作,下午到地里去,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参见:阎纲,《创业史》与小说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8.

导下稳步前进的”^[6]。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争论,最后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结论,合作化被设想成一个逐步的、分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互助组,联合使用劳力,但农民个人仍保留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第二步是初级农业合作社,劳动资产由集体掌握,每个农民根据其交给集体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的多少参加分红;最后是高级农业合作社(完全集体化),取消分红,严格实现按劳取酬。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延河》连载《创业史》,自然实现了小说文本时效性的传播效果,冯牧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5]《创业史》(第一部)初版于1960年6月,到1963年11月,它已印行9次,累计印数达38万7千册^[7]。在这之后所引发的对作品艺术形象的评论^①,在相对沉寂后热评如潮。换句话说就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与“话语讲述的年代”是一致的、同步的,这使得连载中的《创业史》产生及时性、新鲜性的传播效应。

为了凸显这种时效性,柳青甚至在《延河》1959年第10期庆祝建国十周年特大号上连载《创业史》时,在第二十九章里增添了约2500字左右的战争篇幅,从第一段“一九三五年,在陕北安塞县李家山。一支赤色游击队……”起,到“……梁生宝觉得真是枉活了这一辈子!”止,再次体现了柳青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政治觉悟,国庆的氛围使得作家在这期《延河》中凸显了对为新中国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员的讴歌之情。颇有意味的是,这样的战争细节描写,在1977年再版本中悄然消失。

然而,书籍方式的再版本《创业史》则在作品内容的可复制性和完整性方面,与在杂志连载时有明显不同。再版本《创业史》“出版说明”清晰交代“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修改”。这些所谓“修改”明显体现出柳青对作品完整性的追求,他不可能像在《延河》杂志上连载时,可通过后续的小说文本对已刊载的内容进行逐步修改和完善。读者也不可能结合时代特征等待阅读及时性很强的每一期《延河》杂志,一次性阅读往往会直面小说文

本的叙事话语、叙事策略、叙事主题等文本内容,并根据“阅读”的时代特征直接判断作家和作品,换句话说就是“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不再一致,因此,其传播反馈与传播效应自然不能与连载时相比较。其实,1977年再版时的所谓“重要修改”,明确昭示着柳青的“未改变”,再版时的叙事主题、叙事话语、叙事手法等延续着柳青的叙事风格,为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为了配合变化中的文艺政策的要求,柳青以不断的“重要修改”期望《创业史》的小说文本如同每天更新的新闻作品一样具有时效性、新鲜性。

当代学者对1977年再版《创业史》颇有微词的现象,更是值得反思。大多数学者认为“进行了一些重要修改”的再版本是一次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修改,尤其是那些凸显政治路线的内容(如对所谓刘少奇错误路线的批判)刺目而难以接受。由于当下流传的《创业史》几乎都是以1977年再版本为蓝本^②,部分学者以为这种版本的发行会导致普通读者对柳青及其作品的误读,其所产生的社会评价会有失公允。其实,无论是当初《延河》连载的初刊本,还是1977年修改后的再版本,都体现着真实的柳青。真实的柳青都是在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创作来体现不同历史时段的文艺政策,1960年时,柳青说“听党的话,不断改造思想”^[4];1979年,柳青还是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8]。尽管70年代末柳青重新修改《创业史》时,可能受到当时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而造成精神和人格的扭曲,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摆放在历史的档案馆里,没有人可以更改,特别是柳青这样紧跟文艺政策的作家更是如此。若是出于研究需要,不同版本的涉猎本来就是研究者必要的准备,而作为艺术的传承,无论何种版本都一样展示了柳青的创作原则,都是真实的柳青,在这一点上无可厚非。

四、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新版《创业史》的“出版说明”中,编辑明确指

① 柳青同志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子,充分写出了他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和表现了梁三老汉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从而相当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参见:严家炎·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J]. 文学评论,1961(3).

② 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柳青文集》(之前还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之《创业史》第一、二部),2006年7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柳青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之一种,只选《创业史》第一部),使用的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的再版本。

出：“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这些“重要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梁生宝与徐改霞爱情的描写。这部分的修改严格说来，主要是为了不影响小说文本阅读的连贯性，删去作者的一些不必要的议论和某些过于自然主义的描写。如第八章：

他承认：那时间，他要是伸胳膊搂她，她也许不会推开他。但他不能这样做。他相信：正因为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该霞以后更喜欢他了；喜里头带有尊敬，他看得出来。^[9]

在第十五章里：

她低下头，乐滋滋地瞅着过了乳峰、达到腰间的两个辫梢，带着女性共有的“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天赋心情，揣摩生宝看见她这份打扮的心理。^[10]

同时，这一章里的“挂在她身前学生蓝布衫凸起的地方。这是女性的本能：当她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教她，她知道怎样讨她喜欢的男人喜欢她”一段，改成：“她一手提篮，另一只手捉住这条辫子，这样来掩饰她的局促不安。”

在第三十章里：

她将把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着肘子。

她怕他在黑夜看不清楚她笑，又忸怩地动了动穿着夏装显得很苗条的身子……

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啊！

他一想：这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一定有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

在第一部分结局里：

任男人摆布，把男人的搂抱亲吻看作赏赐的女性，是越来越少了。^[11]

以上的引文，在1977年版本中全部删去。这样的修改体现了柳青创作修养的提高，当然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必然的联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关“爱情”的写作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创作主题，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初版后，1959年关于主人公爱情问题的讨论，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也受到了猛烈抨击。在整个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们的创作中就爱情的描写不自觉地渐渐走向枯萎，柳青只不过是慢慢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而已，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作品主人公梁生宝

“高大全”的形象。

第二，关于受侮辱和被损害者形象的描写。受侮辱和被损害者一直是乡土文学中的重要形象，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罗淑《生人妻》中的妻子等。在《创业史》中，素芳是一个受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女性。生母的“贪欢作乐”使她在身世留下羞耻的阴影，父亲因抽大烟而成为浪子，母亲和邻居私通，自己被诱怀孕，公公瞎王二的专制家教，丈夫栓栓像木头人一样的笨拙，生宝对她挑逗的严厉斥责等，都使她感到犹如生活在黑漆的棺木中。解放前，通过对受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描写可以揭露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在新社会里，这种受侮辱和被损害者应该如何描写，是破罐子破摔地继续堕落或继续受侮辱和被损害，还是在新社会中走出人生低谷，翻身做主人？在小说文本的前后修改中，可以看出柳青的苦心。

在1977年版《创业史》第二十一章里，作者删去了这样一些话语：

堂姑父的一只胳膊使劲地但是亲热地抱住她的两只胳膊，另一只劳动过的大手，可怕地向她海昌蓝布衫襟子底下伸来了。

想不到堂姑父在四合院偏院把她按倒以后，她的心重新野起来了。靠她自己，她拢不住她的心了。生理上的男人姚士杰给生理上的女人赵素芳这样大的满足。

素芳的高贵精神在童年的时候已经被娘埋葬了，她的机体结构——一个生理上的女性，深深地敬佩堂姑父做假的本领……^[12]

这些话语的删节，不但没有影响素芳作为被损害者的受侮辱的力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能保持或维护素芳作为弱者的自尊。当然类似于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描写也删去了，如第十八章里李翠娥向姚世杰调情时的心理活动：

但“妹子”不放松这个机会。好容易！妹子已经倚门站了几天了，等着三年前的情哥，从这条路上走过哩。现在，终于等着了！她吃着姚世杰的大米，回味着三年前被姚世杰强壮的胳膊使劲搂着的滋味，她浑身舒服难耐。在全部蛤蟆滩、下堡村和黄堡镇同她有关系的男人里头，只有姚世杰对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她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世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其他想从她身上找寻异性温暖的粗鲁单身汉庄稼人，她摆出一副施舍者的神气，欺凌他们，玩弄他们，

惹他们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失望吗？不来往好了。他们同她的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世上只有两个男人长期占领她的心，一个是前国民党军的穷下士，另一个就是坐地虎姚世杰，他们都是强人，她认为：世上只有强人才有胆量，才敢冒险，才可亲可爱，值得她倚门等候……

她的脸盘红腾腾的，她的牙齿白晃晃的，她的花眼皮眼睛滴溜溜的，她所有的组成面部表情的部分，都在活动，企图引起姚世杰的兴趣。

这样的话语的删节，有助于小说文本艺术性的提高。尽管柳青在修改中删节的内容在当代小说中比比皆是，但柳青能在小说新版时删去这些章节，仍属难能可贵。

21世纪以来“红色经典”的重新解读和再传播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创业史》也在重新阐释和传播中有了新的突破。但是，部分研究者并没有能够从政治性话语中突围出来，也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样”的历史内涵，依旧存在着泛政治化和泛文化化的嫌疑，文本的内在批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当发达的大众传媒对“红色经典”重新解读的媒介传播效应也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其实，像《创业史》这样的“红色经典”在任何时代传播时，都包含着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

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但至少对“红色经典”而言，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13]正是《创业史》中所包含的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得我们这些身处21世纪这个世俗化、物质化、娱乐化时代的乌托邦梦想已经幻灭的人，在接受与传播《创业史》时还能意识到我们对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张炯. 中华文学通史：第9卷[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65.
- [2] 柳青. 创业史[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
- [3] 柳青. 怎样评析徐改霞[N]. 文汇报，1961-10-12.
- [4] 柳青. 永远听党的话[N]. 人民日报，1960-01-07.
- [5] 冯牧. 初读《创业史》[J]. 文艺报，1960(1).
- [6]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69.
- [7] 伯牛. 出版一本什么样的《创业史》[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3)：2.
- [8] 柳青. 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 延河，1979(6).
- [9] 柳青. 创业史[J]. 延河，1959(5).
- [10] 柳青. 创业史[J]. 延河，1959(6).
- [11] 柳青. 创业史[J]. 延河，1959(11).
- [12] 柳青. 创业史[J]. 延河，1959(8).
- [13] 张法. “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G]//方宁，陈剑澜. 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Revis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GU Peng

(Phoenix Communication College,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To pursue unceasingly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the literary policy, many novels of “17-year literature” have been continually revised after the first edition and Liu Qing’s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s one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e revision of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mainly involves the four aspects of changes of dissemination theme, dissemination subjects and objects, dissemination carrier and the dissemination content. Its revis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has reflected clearly the complex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cy of literary arts.

Key words: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edition; revision; dissemination; revolutionary classic